

编译参考 增刊

国外思潮

(一)

为颓废的欧洲辩护

〔法国〕雷蒙·阿隆



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

为颓废的欧洲辩护

(法)雷蒙·阿隆

外文出版局研究室

1978年12月·北京

出 版 景 貌 明

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变化很大很快；反映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要求的各种思潮竞相争夺舆论阵地，扩大影响。为了给关心国际问题和思想动向的同志们以及有关部门提供参考资料，本刊选择介绍国外有影响、有代表性并且较有系统的作品，包括各种倾向，各种色谱，而以反面言论为主，以便有助于读者了解敌友我各方面的动向。

本刊为《编译参考》增刊，定名《国外思潮》，不定期出版，每期约十万字，酌收工本费。

目 录

一、 从马克思到索尔仁尼琴·····	3
二、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18
三、 谁对计划人员实行计划？·····	40
四、 东西方之间的未来·····	66
五、 一个虚构的社会主义之重新发现·····	74
六、 欧洲共产主义的阴影·····	92
七、 左翼的共同纲领·····	105
八、 衰败中的英国的情况·····	116
九、 托克维尔法则·····	127
十、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	136
十一、 在红军的阴影下·····	144
附录：	
书名的由来（原书代序）·····	159
巴黎通讯：事后证明雷蒙·阿隆是正确的 列奥波德·拉别茨·····	167

为颓废的欧洲辩护

(法) 雷蒙·阿隆

编者按:

去年,法国右翼资产阶级思想家雷蒙·阿隆为了配合今年三月的法国议会选举,写了一本书《为颓废的欧洲辩护》(Raymond Aron, *Plaidoyer pour l'Europe décadente*, Robert Laffont, 1977)。这部作品实际上可说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一份宣言书,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为一次选举而进行宣传的范围;这也是《文汇》(*Encounter*)月刊用很大篇幅在去年九、十月号上连载这本书的英文摘要的原因。作者在书中全面否定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其立场是非常反动的。但是他采取了分析的说理的方法,他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分析以及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可以启发人们去进行思考。

雷蒙·阿隆今年73岁,他是著名的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教授,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自由法国》主编,后来在《战斗报》和《费加罗报》工作过。他曾在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任教,是法国,美国和英国一些有地位的学术团体的成员,写过许多著作,包括《历史哲学绪论》、

《知识分子的鸦片》、《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阶级斗争》、《民主与极权》、《进步的幻灭》、《暴力的历史与辩证法》等等。作为有代表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同欧根·彭-巴卫克和弗列德里希·冯·海叶克等的著作一样值得注意。

《文汇》是美国“争取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在英国出版的一本文艺、政治性月刊，经常刊登资产阶级右翼有影响人物的文章，主编为梅尔文·腊斯基和安东尼·斯威特。这本月刊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是西方资产阶级右翼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阿隆原书为法文，共511页。我们这里全文译出的是《文汇》刊登的英文摘要（这个摘要是重新写过的，同原书文字上有出入）。另外，把原书序言译出（删去重复部分）。《文汇》在刊登这个作品的同时，还登载了列奥波德·拉别茨（英国《研究》季刊主编，《文汇》月刊顾问委员会成员）的一篇“巴黎通讯”，分析了阿隆这本书的思想背景，也一并译出，附在后面，供参考。（文内方括弧是译者的注释。）

阿隆的文风和国内阅读习惯相去甚远，我们的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可能会造成国内读者阅读上的一些困难，希望谅解。

一、从马克思到索尔仁尼琴

西欧在经历了25年空前的经济增长之后，目前正在经历一次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危机。缺乏信念的人们正在转而面向一种他们已经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在上届法国选举(1974)的过程中，分别在公开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各项声明上签名的人数之悬殊，使我深为感慨：支持前者的有好几百人；支持后者的最多不过几十人。看来律师、学者、作家、演员的绝大多数支持社会党、共产党反对派的领导人，而其他人士，也许数目同样多，不敢冒风险公开宣布他们支持所谓右翼人物（或是反对左翼的人）。

我感到自己好像被带回到40年以前的时代；从我的记忆深处泛起了往日的回忆。柏林（那时我是从巴黎来的一个研究生）的朋友们问我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它是“未来的潮流”，正在把德国青年和成百万绝望的人引向悲惨的归宿。今天，朋友们私下里在议论：社会党共产党联盟总有一天要获胜，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既然如此，迟不如早。我从各个方面听到人们提出这样的假设——要么社会党共产党按照共同纲领组成的政府将被证明有能力治理国家而不同西方决裂，也不窒息基本自由，而且共产党将被重新融合到国家生活中来；要么可能性更大的是社会党共产党联盟会象人民阵线在1936年失败那样遭到失败，而现在的多数派又回来掌权，并且比现在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有能力进行改革。

可能（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经验会在1978年选举中获胜之后不久的将来实现。谁也不会想到要把两

大左翼政党的领袖们比做希特勒或斯大林。此外，现在我看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距离相当大。然而正是这些区别，包含着更大的危险。人们对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以新的面貌出现，并且宣布了它们的独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现在欧洲重新统一，被雅尔塔屠刀* 分割成两半的大陆重新统一，不是已经迫在眉睫了吗？

在意大利有“历史性的妥协”，在法国，有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掌权；两个欧洲之间的均势——尽管这个均势对于世界力量均势是不可缺少的——还剩下点什么东西呢？我并不否认这些共产党想同苏联（肯定是同斯大林的俄国，也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俄国）保持距离，但是当他们宣布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时，不论他们是否真诚，他们仍然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同属一个大家庭。他们宣称信奉的教义基本上和苏联一样，并且多年来做同样的解释；他们并没有放弃“民主集中制”他们对于将来政府的观念仍然同苏联的观念完全一样，尽管他们坚持声称他们将避免其极权的含义。欧洲共产主义者是否在掩盖他们的目标，这一点并不象他们的方法和思想所可能或必然造成的后果那么重要。

换句话说，西欧的自由受到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综合效果的威胁：军事上强大的苏联，其军队（用1949年戴高乐将军讲过的话来说）仍然“离法国边境只有两天的行军”；意共和法共在选举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后是欧洲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 我只是重复一个传奇。说三巨头在雅尔塔决定分割世界和分割欧洲，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颓废派和梦想家

应该说是失去信心呢？还是单纯的自我批评？应不应该对欧洲人如下的能力表示景仰呢？他们谴责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缺陷，并把这些缺陷夸大到完全无视人类及其制度固有的不完善性的程度。

在生产率，技术革新，生活水平，科学进步和人类自由这些方面，是西方，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在过去30年内走在前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试图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以贬低这些成就，好象西方的繁荣是靠剥削第三世界而不是靠真正的工作和生产率。我们并不否认过去几个世纪殖民帝国对欧洲财富所起的作用，但是人们必须承认，第三世界今天正在从世界经济的欧美中心寻求援助，正是西方，而且只有西方，才有办法逐步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喜欢抱怨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然而，当一位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因军事政变而被赶出本国时，他到什么地方去避难——难道是到莫斯科去吗？

那么，人们难道不应该为自由欧洲，或者说我们颓废的欧洲，辩护吗？说实在的，到底两个欧洲当中哪一个才真正应该被称为是颓废的呢？

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个主题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缠住人们的头脑不放。今天，历史家们仍在辩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宏伟而强大的政治结构崩溃。只要提起丘吉尔如下的话就够了，他说“我不会主持大英帝国的解体”，或者是戴高乐将军，他想把三色旗在1939年以前飘扬过的每一个地方，再高举起来。提起这些，就能懂得关于“非殖民化”的一种观点。时髦的词汇

——从统治我们这整个星球的思想和道德上的正统所必然引申出来的价值判断——都毫无保留地谴责“殖民主义”而颂扬“人民的解放”。然而，在意识形态的战斗中，欧洲人有权因“放弃”自己的帝国而邀功。法国人除外——他们曾两度（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战斗，妄图抵抗不可抗拒的历史运动——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都更加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帝国角色。利用军事胜利以扩大领土并把其制度和意志强加给一亿欧洲人* 的正是苏联。

如果历史上的冲突在正义和道德的法庭上明确地展示出来，西欧的辩护人能够从容为自己申辩，并且确实能够赢得诉讼。不幸的是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种审判，这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掩盖着，而且不受普遍良心所妨碍的审判。

苏联保持了它的帝国，目前从魏玛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英国和法国丧失了它们的帝国；不论它们想不想保持自己的帝国都改变不了事情一丝一毫：难道放弃不是和顽强抵抗一样表明颓废吗？无论如何，正当欧洲各帝国已经化为历史陈迹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宣传品作者们还在继续抱怨“西方帝国主义”：

让我来看一看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尽管西欧有财富，有文化和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整个西欧不相信自己有能力

* 下面是苏联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而并吞的领土：芬兰各省（44,158平方公里，居民500,000人，1938年被占领）；波兰各省（178,705平方公里，11,000,000居民）；罗马尼亚各省（比萨拉比亚44,288平方公里，3,200,000居民；北布科维纳10,437平方公里，500,000居民）；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47,396平方公里，1,122,000居民；拉脱维亚65,784平方公里，1,951,000居民；立陶宛55,683平方公里，2,957,000居民）；东普鲁干（11,655平方公里，300,000居民）。

单独捍卫自己。它求美国保持一支美国军队作为跨大西洋的核威慑力量的象征，以面对驻在欧洲心脏地带已有30年之久的苏联师，从而保障欧洲的政治均势和安全。

西欧的颓废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无可怀疑的。为了克服反对意见，只要以“衰落”一词代替“颓废”就行了。“颓废使人想到是一种价值的判断，是一种变迁的方案。而“衰落”仅仅说明力量关系。英国经济的衰落从19世纪的最后1/3就开始了，不是当美国的工业生产超过联合王国工业生产的时候，而是从德国在发展新兴工业（例如化学工业）方面，走前面的时候起。同样，法国在19世纪的衰落是法国和欧洲其它地区人口增长差距的必然结果。

“发展不平衡规律”（用列宁的公式）同样适用于人口、经济、科技革新和政治军事力量。英国曾经是世界市场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其海军曾统治各大洋，由于它不能掩盖其力量的丧失而衰落下来。它迟早不得不满足于同它的岛屿领土和人口不像过去那样不成比例的地位。

同样，整个西欧在1914年战争前夕享有的主导地位，使它注定或迟或早要衰落下来。把某种自由主义引为骄傲的民主政府不能长期保持对于帝国主义宗主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那些可疑的长处。在国内宣布的价值和对外统治的实践之间的矛盾，既破坏那些价值也破坏对外实行统治的力量。即使没有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也避免不了衰落，尽管不致如此之迅速或戏剧性而已。但是我在这里只想强调1939—45年间的事态发展，意味着西欧的衰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它甚至连它的经济资源，且不说其广大领土，本应赋予它的那份政治军事力量都没有掌握。

确实，西欧继续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方面占有同它的人

口很不成比例的地位。战后30年来，它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值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已经接近美国。不论是祸是福，西欧对军事失败所做出的反应是掀起建设的热潮；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西德、法国和意大利跑在前面，至于大不列颠，则不论变得更加明智或是更加听天由命，让自己被共同市场六国所超过。

让我们假定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属于“生产者”（用圣西门的话来说）而不属于武士：前景马上就变了。从苏联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辆坦克，那些用来在布拉格重新建立正统（他们并不需要那么多），或是在中东或非洲煽起小型战争的坦克，又有什么用处呢？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旧大陆各工业国家之间的战争，会使胜利者付出巨大代价，这还是假定人们能够在放射性污染的瓦砾堆里辨认得出谁是胜利者。胜利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苏联从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到巨大的利益；从欧洲比从美国更容易取得这种科学技术。尽管他们有热切的信念，克里姆林宫的那些人肯定怀疑他们自己的政权在窒息发明创造；他们懂得（至少暂时）他们需要“颓废”的欧洲的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性。

这个欧洲卖给苏联机器和工厂，并向它购买原料——这种交易是典型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回到一种较为乐观的观点：军事帝国已经过时——从现在起，科学技术和生产率将决定个人和国家的名次。照这样排队，苏联是落后了。如果全人类正在走向技术的普遍时代，今天领先的不是苏联。相反，它正在靠抄袭和借用，艰难地在后面跟着。

然而——这里我们又回到令人不安的问题上来——科学技术（正在使我们的生存状态颠颠倒倒）真的能够决定各国的命

运吗？难道按照马基雅维里所规定的含义，virtu 不是仍然指的是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和历史性的生命力吗？而且这些品质不是仍然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命运的最终根源吗？突然，前景改变了，颠倒过来了。

或多或少列宁主义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继续在西欧传播，由法国、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的学校和大学加以传播和灌输。自然，通常并不是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正在变成欧洲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如同莫里斯·梅尔娄-崩迪20年前所写的那样（奇怪的是他写的是格奥尔基·卢卡奇），正在变成“西方的”。罗马和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们起草了争取新自由的各项激进宣言——刚刚来自东方从古拉格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痛苦地低语：他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我并不否认今天仍然有可能拣起马克思的一些论断用以批判西欧的经济和社会。然而这些论断，及其措词是到处都能找到的；人们要是不想证明自己是遵循左翼主张的，本来是没有必要从资本主义初期的同时代人那里去借用这些论断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奇怪的着迷难道不是首先反映了人们所熟悉的“异化”，以及知识分子历史性的变节吗？这种变节预示政权由于失去合法性而逐步削弱直至灭亡。

社会如果不能以其本身的原则和方法的精神来回答事态发展的挑战，它就处在成为自己的牺牲品的危险之中。在经历了奇迹般的战后发展之后，出现了三个新的问题：（1）“滞胀”，停滞和流行性通货膨胀相结合；（2）“魏玛”综合症，换句话说，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个民主社会的选举结构只能让人们在两种形式的自杀当中进行选择：要么把权力交给那些

将会毁灭这个社会的人，要么违反自己的合法性原则；(3) “文化危机”，责骂社会实行“镇压”，而实际上它首先是“纵容”。

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更一般地说自由派和进步分子，都否认在有希望的憧憬和历史潮流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在进步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突出地肯定关于人类利益和社会实际之间存在着和谐的信念具有科学性，而且提出在现在和将来之间在可恨的资本主义和和谐的社会主义之间，将有灾难性的革命过渡。我没有他们那样的信念。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将尽全力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来使将来尽可能反映我们的愿望。我不认为将来会消除对抗或是体现我们的梦想。在希特勒或斯大林时代生活过的人们懂得最坏的事情总是可能发生的，保持信心意味着相信这并不总是肯定的。

索尔仁尼琴之后的神话

1917年革命之后的时代有两大伪科学的神话作为标记。现在这两大神话：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矛盾而毁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的改造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改造）还剩下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冒遭到巴黎的马克思主义者讽刺的风险，在这里部分引用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呢？在这封信里，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那是一种“老得不可救药”的“老朽学说”，而且即使在它处于高峰时期的几十年里，它的所有预言也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它“从来就不是科学”。

1. “预言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之下将受到无尽的压迫，并且决不会取得任何成就，做出这样的预言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人们不可能坚持说工人阶级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而不显得荒谬。

2. “声称欧洲各国的繁荣靠的是它们的殖民地，这种说法不得要领。这些国家只是在摆脱了殖民地之后，才开始实现它们的‘经济奇迹’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在一切诡辩面前，索尔仁尼琴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提出或坚持的论点认为，无产阶级的上层其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剥削殖民地的结果。把这个论点拿来同像荷兰这样的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对照，它是站不住脚的。过去荷兰从印度尼西亚得到相当多的收入，但是在它失去了帝国之后，仍然提高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3. “预言社会主义者只能通过武装起义取得政权是彻头彻尾的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地这么说过，也可能他并不总是这么想的。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仍然坚持他们的教条，宣称那些和平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犯了“背叛社会主义”和“不是破坏而是改良资本主义”的罪行。他们的救世哲学要求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人们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包含着暴力决裂，那么，没有这样的暴力决裂，当权的社会主义者就没有实现真正的使命。

4. “认为最早的起义会在发达的工业国发生，是估计错了——实际上是正相反。还有，这个学说描绘的这么一幅图景：整个世界将怎样迅速地被革命所席卷……又该如何评价？”这个论点尽管具有经典性质，是不能用我所说的 *le schéma du devenir historique*（历史性的演变方案）来加以驳斥的。当然，人们能够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其它国家不会再现英国经验，以及革命在其它地方（即不只是最发达的工业社会）发生的可能性的论述。事实仍然是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并没有导致革命的爆发。然而，资本主义自我毁灭——本身内部矛盾的牺牲品——是马克思的中心论点之一，而且为他

的信徒们一直坚持直到被事态的发展所否定。

5. “关于国家……如何迅即消亡的图景完全是幻想，是对人性的极端无知。至于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而结束——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到现在为止最长的战争，而且15年至20年拒绝谈判和停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且苍天不容，我们可能看到人类所有的战争中流血最多、最野蛮的战争——在两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之间发生。还有民族主义的问题，也是这个学说在1848年就把它当作“残余”埋葬了一然而却在当今世界上成为更加强大的力量”。应不应该把15年或20年的冷战就称之为“战争”？是只有苏联拒绝谈判和停战吗？至于其它，社会主义不仅远远没有抑制民族主义，反而加强了民族主义。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敌对证明——如果还有必要证明的话——过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国家间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依然存在。

6. “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准确，不仅并非科学，不仅没有成功地预言任何一件事——其数字、数量、时间和地点（这些东西今天的电子计算机在社会预测方面干得那么轻易，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尽管从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它绝对使人震惊，因为它试图以经济和机械的粗糙性来解释最微妙的东西——人，以及甚至更加复杂的千百万人的综合体——社会。只是某些人的贪婪和其它一些人的盲目性以及另外一些人渴望有一种信仰，才能解释20世纪的这种冷酷的幽默：这样一种名声扫地的破了产的学说怎么会在西方仍然有这么多信徒！在我国，所剩无几！尝过其味道的我们，只是假装不管愿意不愿意……”

想思史上的一些情况

1914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不再起它作为

第二国际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作用。1917年以后，它成为证明苏联经验是正当的根据。从那时起，它的命运是由宣布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以及由据称是根据这一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所决定的。用神圣的言词来说，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祖国，在那里由于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接收了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从而使资本主义归于消灭。

肯定地说，这一事件无论如何并没有证明预言。根据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当其矛盾已经达到破裂点的时候才能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沙皇俄国是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尽管如此，忠实的信徒们还是找到了马克思的某些著作，曾经对他所设想的历史发展的严格性作了修改或更正。也许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它有可能从村社集体所有制的旧形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于英国政治经济的分析揭示了“理想的典型”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并没有能够预言它的未来，不论是在一个一个的国家，或是在整个世界。唯一剩下的东西，就是预言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候，作为不可预见的事态发展的结果，会实现普遍的社会主义。俄国是“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表明：不用等待马克思所自吹自擂的那些矛盾，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在两次大战期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分裂为两个阵营：布尔什维克（包括所有拥护第三国际的人）和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接受苏联作为预言的实现。列宁和考茨基之间的辩论至今仍然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正是考茨基指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雄心之间存在着差距；正是他赋予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理论带给无产阶级，对之灌输历史使命感这一任务。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内保持了民主程序，